

〔第六卷〕

王向远著作集

中国比较文学百年史

宁夏人民出版社

中国比较文学立足本土文化，

努力吸收和消化外来文化的营养，体现了博大的文化襟怀……



王向远著作集

第六卷

C52/35
:6
2007

中国比较文学百年史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向远著作集. 第6卷, 中国比较文学百年史 / 王向远著.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7.8

ISBN 978-7-227-03550-3

I. 王… II. 王… III. ①王向远—文集②比较文学—文
学史—中国 IV. C52 I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21485 号

王向远著作集

中国比较文学百年史(第6卷)

王向远 著

图书策划 哈若蕙
编辑统筹 史 芒
责任编辑 谭立群 哈若蕙
装帧设计 吴海燕
责任印制 来学军

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出版人 高 伟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 (750001)
网 址 www.nxcbn.com
电子信箱 nxcbmail@126.com
邮购电话 0951-504461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精捷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30.5
字 数 435 千
印 数 4250 册
版 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7-03550-3/C·99
定 价 47.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王向远 1962年生，山东人，文学博士。1987年起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96年破格晋升教授，2000年起担任比较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东方文学学会会长、北京大学东

方文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理事、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理事、中国抗战史学会理事等职，入选国家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北京市社科理论人才百人工程”，获“北京师范大学教学名师”称号。

已独立承担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和北京市社科研究基金项目5项，主持、主编国家重点图书（丛书）出版项目2项，发表文章110余篇，出版论著17部（含合著4部），文学译作4部，主编丛书4套50余册，编著若干。学术反响文章大部收于《初航集：王向远学术自述与反响》（重庆出版社2005）一书中。

曾获首届“北京高校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比赛”一等奖、第四届“宝钢教育奖”全国高校优秀教师一等奖、第六届“霍英东教育基金”高校青年教师奖等；有关论著曾获北京市第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001年、2002年度华东地区优秀教育图书一等奖、二等奖，入选国家首届“‘三个一百’原创出版工程”。



王向远在宅书房（2004年）



《王向远著作集》出版说明

弘扬中华学术，传承优秀文化，汇集学术精品，是宁夏人民出版社一贯的追求。2002年以来，本社已先后推出了“跨文化丛书·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全十卷）、“人文日本新书”（已出二十种）、《李庄文集》（全四卷）、《梅志文集》（全四卷）等一批具有文化积累意义和体现学术创新的图书，受到了业界和学界的广泛关注与认同。

《王向远著作集》是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度重点图书选题，是本社首次出版以“著作集”命名的大型学术丛书，也是国内少见的、为中壮年学者出版的大规模文集。《王向远著作集》收录2007年为止正式出版的王向远主要著作的单行本，并加以修订，编为十卷，总字数近四百万，内容涉及东方文学、日本文学、中国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翻译文学、日本侵华史、中日关系等多个领域。各卷依次为：

第一卷：《东方文学史通论》

第二卷：《东方文学译介与研究史》

第三卷：《日本文学汉译史》

第四卷：《中国题材日本文学史》

第五卷：《中日现代文学比较论》

●第六卷：《中国比较文学百年史》

第七卷：《比较文学学科论》

第八卷：《翻译文学研究》

第九卷：《日本侵华史研究》

第十卷：《日本右翼历史观批判研究》

本书为《王向远著作集》第六卷，所收《中国比较文学百年史》由《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二十年》（江西教育出版社 2003）和《20 世纪中国人文学科学学术史丛书·比较文学研究》（与乐黛云合著，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6）王向远执笔部分增改而成，是由个人独立撰写的第一部完整的中国比较文学百年学术史。

特此说明。

宁夏人民出版社

《王向远著作集》编辑出版委员会

2007 年 8 月

解 说

陈 惇*

我怀着急切和期盼的心情读完了向远的《中国比较文学百年史》，掩卷之后，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很久以来，我盼望着学术界对比较文学学科史给以应有的重视，希望有更多的学科史著作问世，把我们的学科史研究扎扎实实地开展起来。向远的新著适应学科发展的需要，而且以其出色的成果为学科史研究做出了贡献。

比较文学已经在中华大地上落户扎根，这是毫无异议的，譬如说我们有了多种学科理论著作，有的著作在学科理论中国化方面做出了可贵的尝试，我们有了“索引”、“年鉴”、“总书目”等一批工具书，我们有了《中国比较文学》等核心刊物，我们建立了从本科到博士的专业人才的教育培养体制。而这一切成绩的取得，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为继往开来，就特别需要进行学科史的研究和总结。到20世纪末为止，中国比较文学走过了一百年的历程，即使不算前几十年，单算复兴后的历程，也有了将近三十年。一百年和三十年，这两个数字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在新世纪刚刚开始之际，在国际国内比较文学面临新的转折的时期，回顾历史，总结经验教训，温故知新，必将有利于推动比较文学学术事业的继续发展。而且，研究学科史也是当前比较文学教学的迫切需要。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十几个比较文学博士点和几十个比较文学硕士点，培养比较文学

* 陈惇（1934~），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的主要开拓者之一，曾任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现任中国比较文学教学研究会长。

专业人才的教学已经大规模地开展起来。为了培养合格的专门人才，学科史应该成为研究生的必修课程。因为一个专业的研究生，如果不了解学科发展史，不了解本专业的过去和现在，就很难说他的知识结构是完整的齐备的。即使从撰写毕业论文的角度来看，他们也必须具有这方面的知识储备，否则他们的论文从选题到写作，往往难以创新。另外，研究学科史，还是开展国际学术交流的需要。有了这方面的著作，就仿佛是坦诚地向国际学术界展示我们的家底，让朋友了解我们的底细，以便更好地进行对话和互动。

在向远的这部著作之前，我国学者包括向远在内已经开始进行比较文学学科史的研究，出版过几部相关著作，如杨周翰主编《中国比较文学年鉴·1986》、徐志啸的《中国比较文学简史》、徐扬尚的《中国比较文学源流》、杨义、陈圣生合著的《中国比较文学批评史》、王向远的《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十年》、乐黛云、王向远合著的《20世纪中国人文科学学术史丛书·比较文学研究》等。向远是学术研究的有心人，他早就意识到了学科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记得十年前，在他为我们研究所策划《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建设丛书》的时候，曾提出过编写比较文学学科史的选题。那时，由于这样的题目工作量大，更由于时间仓促、准备不足等原因，这个选题无人认领。但是，向远并没有放弃，他下决心自己动手，从头做起，在普查资料的基础上步步深入地进行研究。于是，他发动研究生，普查全国报刊和出版物，完成了一部比较文学论文索引。这是一部从20世纪最后二十年的比较完备的论文索引。与此同时，向远开始了学科史的研究。那时，正值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成立二十周年，也是我国比较文学欣欣向荣、成果空前，因而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向远就从这里下笔，不失时机地写出了《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二十年》。这两项成果，都列入了我们研究所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建设丛书》并已出版。应该说，向远已经为学科史的研究做出了很大的成绩，但是他并不满足于已有的成绩，继续为写出一部完整的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史而努力。他从最近的二十年入手，由近及远，扩展到新中国成立后五十年，与乐黛云教授

共同撰写了《20世纪中国人文学科学学术史丛书·比较文学研究》。此后，他又继续研究20世纪上半期的学术史，终于完成了他的学科史研究的夙愿——由个人撰写的完整的中国比较文学百年史。当我看到向远送来的《中国比较文学百年史》稿子的时候，不由得回忆起他“十年磨一剑”的过程，其间的辛劳艰苦可想而知。我由衷地佩服他的那种在学科史研究上锲而不舍的精神和科学的、有条不紊的研究方法。与此同时，我也想到，向远之所以能够顺利地完成学科史的研究，与他多年的比较文学、翻译文学、外国文学教学与研究，特别是近些年对比较文学原理的钻研，有着密切的关系，那是他不可缺少的理论准备和知识准备。智慧、毅力和勤奋，铸就了一部新著，对比较文学的学科建设可谓功德无量。

《中国比较文学百年史》按照历史顺序论述我国比较文学的发展过程，共十二章，前面冠有一篇“前言”。在我看来，这篇前言是全书写得最精彩的章节之一。之所以说它精彩，是因为它不仅以简练的文字全面概括了中国比较文学一百年的历史和功绩，同时又不停留在对发展过程的一般描述上，它在历史交待的同时，把论题引申，提出一些重要的令人关心的问题，并且阐明自己的看法。不管这些看法是否能够得到认同，但可以看出，向远在他回顾历史的时候，总是在不断地进行深入的思考，提出一些很有价值的、有启发性的见解，而且从理论上阐发自己的看法。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前言”就是全书的纲领和精华。我们不妨以这篇“前言”所论述的问题为基础来观照全书。

“前言”共三个部分，分别论述了三个问题：中国比较文学的诞生；中国比较文学一百年的发展过程；中国比较文学一百年的成就和贡献。关于中国比较文学的诞生，向远首先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历史悠久的中国传统学术中未能孕育出以跨越异文化为根本特征的比较文学呢？为什么两千多年中华各民族之间文学的交流、一千多年以佛经翻译为纽带的印度文学对汉文学的输入、一千年间汉文学在东亚国家的传播与影响，却都没有促使中国产生以中外文学交流为研究对象的“比较文学”学科，甚至没有在文学研究中自觉地运用跨文化的比较方法呢？”文中排除了几种他

所不能同意的看法之后，谈了自己的观点：根本的原因是：“传统中国人缺乏那种依靠输入外来文学来更新自身文学的自觉而又迫切的要求”，而近代以来，由于西学东渐，国情变化，迫使人们改变旧观念，有了世界意识，萌生了比较观念，形成了比较文学研究的前提与基础。当然，这并不是向远对中国比较文学诞生原因的全面分析，我们在第一章里，看到向远更强调“世界视野”、“世界意识”的形成和重要性。以上三个方面的结合，即国情的变迁，世界意识的形成，以及比较意识的产生，成为中国比较文学诞生的先决条件。这无疑是一个全面的看法。比较文学是一门国际性的学科，它首先诞生于欧洲，繁荣于西方，我国比较文学的产生晚于西方国家，而且也确实接受了西方的影响。因此，在记述这段历史的时候，容易过多地重视外来影响，着力去寻找这种影响的蛛丝马迹，也就是说，过多重视了外因。向远在论述这个问题时，着重探讨了中国比较文学产生的内因，那就是中国旧传统里的那种自满的、保守的、封闭的意识是如何被打破的。从这里出发，他分析了晚清以来客观上社会的、历史的以及中国学术界观念的巨变，比较文学如何成为一种迫切的需要，历史的必然。

这样的分析抓住了问题的关键，比较准确全面地说明了中国比较文学产生的原因，同时，这样的分析能够顺理成章地阐明中国比较文学的特点。向远从发生学的角度，对比了中西比较文学，总结了中国比较文学的三个基本特点：第一，“法国及欧洲的比较文学强调用实证的方法描述欧洲各国文学之间的事实联系，而中国的比较文学一开始就具有强烈的中外（主要是中西）文学的对比意识或比照意识；欧洲比较文学主要强调的是欧洲各国文学的联系性、相通性，而中国比较文学则具有强烈的差异意识。从这一点上看，欧洲比较文学重心在‘认同’而不在‘比较’，中国比较文学重心在‘比较’，而非‘认同’”。第二，“欧洲比较文学是在欧洲文学、乃至西方文学这一特定的区域文学内部进行的，它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都是一种区域性的比较文学；而中国比较文学一开始就是在世界文学的大背景上发生的，而且一开始就跨越了东西方文学，具有更广阔的世界文学视野”。第三，“比较文学当初在法国及欧洲是作为文学史研究

的一个分支而产生的，它一开始就是一种纯学术现象，一种‘学院现象’；而中国比较文学从根本上说就是一种文化现象、人文现象，它与中国文学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密切相关。它首先是一种观念、一种眼光、一种视野，它的产生标志着中国文学封闭状态的终结，意味着中国文学开始自觉地融入世界文学中，标志着中国文学开始尝试与外国文学进行平等的对话”。关于第三个特点，记得杨周翰先生曾经说过，与西方比较文学诞生于学院因而带有纯学术的特点相比，中国比较文学诞生在民族危机严重、人们努力救亡图存的过程，因此往往与民族命运的探索息息相关。当然，杨先生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明这个问题的。

“前言”的第二部分，概括了中国比较文学一百年的发展史。向远认为：纵观 20 世纪一百年间中国比较文学发展演进历程，可以看出百年学术史经历了四个历史阶段，即：1898~1919 年为发生期；1920~1949 年为发展期；1950~1979 年为滞缓期；1980~2000 年为繁荣期。向远在这里还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来说明这一百年的总体特征：

这个结构的形体就像是一个“酒葫芦”：发生期的二十年是葫芦尖，发展期的三十年是葫芦上半部分的“小肚子”，滞缓期三十年是小肚子下面的葫芦细腰，最后二十年的繁荣期是葫芦的下部的“大肚子”，也是容积最大的部分。这种酒葫芦状的史态描述，可以反映中国比较文学百年史不同阶段的实际情形。前三个阶段共八十年，是最后二十年崛起与繁荣的漫长的前奏；最后二十年中国比较文学的崛起与繁荣，才是中国比较文学百年学术史的重心之所在。

这个形象的比喻准确地描述了中国比较文学一百年历史的整体面貌和它各个时期的实际情形，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对于这四个时期的特点，以及形成这样特殊轨迹的原因，文中也有精辟的分析。不过，作为划分不同时期的标准却是双重的。第二个时期和第三个时期的划出，可以理解为

以社会的历史的变迁为标准，即五四运动和新中国的成立，作为中国历史的转折点，同时也成为比较文学历史的转折点。然而，第四个时期的划出，以钱钟书《管锥编》的问世为开端，那是以标志性学术著作的出现为标准了。也许由于中国比较文学的历史发展与社会历史的变迁的确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在描述它的演变过程、划分历史时期时，采用社会的历史的标准不失为可行的原则。但不同历史时期有没有共通的标准？向远把中国比较文学产生期的开端定在1898年，并没有说明为什么这样定。是不是因为梁启超在这一年发表了《译印政治小说序》？但是，向远并不认为那是严格意义上的比较文学论著。向远还在文中提出，产生期的比较文学是从“文学比较”到“比较文学评论”，再进入“比较文学研究”的，从宽泛意义上的比较文学到严格意义上的比较文学学科，中国比较文学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形态是有所不同的，看来不同的历史时期难以使用同一个标准来衡量，不同时期采用不同的标准，是符合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史实际的。

本书用大量的篇幅总结了一百年来的成就。过去我们笼统地感到中国比较文学成绩不小，却没有一个明确的认识。读了向远的著作，才看到这里的业绩真可说是蔚为大观，成绩辉煌。其中有两点更让我感到震撼。一点是文革之后比较文学进入繁荣期后的盛况。这一时期比较文学的学术队伍之大，涉及领域之广，学术成果之多，优秀产品质量之高，实在让人吃惊，恰如向远所说，不愧为世界之最。由此我也深深地体会到向远所说，在当今国际比较文学发展到第三阶段，比较文学在西方国家已经不那么兴旺的时候，中国比较文学应该有能力担负起扛大旗的重任。另一点让我感到震撼的是书中对滞缓期比较文学成果的阐述。过去，说到1949年到1979年之间的比较文学，仿佛没什么可说的，然而向远告诉我们，比较文学并没有消失，尽管在官方的体制里受到歧视和排斥，作为一门学科，它已经无人提起，但是，在学术领域里，它依然存在；即使受到了某种扭曲（如政治意识的影响），它依然在发展。这让我看到了比较文学的强大的生命力。在那样的年代，它仿佛存活在大石的重压之下，却能在缝隙中钻出来，开放出诱人的花朵。在当今全球化时代，在改革开放、文化交流空前

繁荣的时代，应是如鱼得水，更有着广阔的天地。我相信，在这样的时代，它的生命力只会更加旺盛，而决不是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已趋消亡。

从向远的《中国比较文学百年史》中，我们可以看出，百年来，特别是近二十年来，中国比较文学的主要成果在于清理本国文学与外国文学之间的关系，这也是中国比较文学的一个显著的特点。钱钟书先生曾经说过，比较文学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清理各国文学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事实。这是一项巨大的工程，一项具有历史性的伟大工程。向远在他的著作中告诉我们，中国比较文学学者几十年来的工作，主要就在完成这项任务。他先分别就中国文学与各个地区或各个国家的文学之间的关系为题，列出章节，每章每节的论述又以该题的研究史为序，以其中的优秀作品为重点。这样一种纵横交错、点面结合的方法，形成一个以本土文学为核心的、辐射形的网状结构，全方位地囊括了百年来的学术成果。这是向远的一个精心设计，有效地完成了一百年的总结。向远的专长是东方文学研究，所以在中国与东方国家的比较研究中显得得心应手，游刃有余。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在中国与西方文学的比较研究中下了很大的工夫，因此，这部分的研究成果也同样精彩。

清理本国与他国的文学关系，这样一项巨大的历史任务，也许需要几代学者的努力才能完成。二十年来，我们究竟做了哪些事情，做到了什么程度，有哪些成绩，有哪些不足，今后还有哪些工作应该进行？向远的历史总结为我们回答上面这些问题，提供了依据。还有一点值得我们赞赏的是，面对数量众多的史料，面对各种复杂的情况，向远不图快，不偷懒，不走捷径，而是踏踏实实地从收集和阅读第一手材料做起，对于那些重要的作品，他更是细心研读，从理论上给以分析，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评价。我们不难发现，向远在著作中多次提到“严格意义上的比较文学论著”这样的术语，这是他面对学科有所泛化的现实，自己在统计和选择研究对象时规定的一个原则。这是一种严肃的、认真负责的学术态度。正是这样严格的选择、理论的深度、鲜明的评价，形成了本书独特的风格和学术价值。

向远的《中国比较文学百年史》中实际也提出或者反映了我国比较文学研究中曾经发生过的或者还存在着的一些问题。譬如，从向远的百年总结中可以看出，我们在影响研究方面的成果要大大超过其他的各种研究类型，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相对滞后（也许与向远用“严格意义上的”标准来衡量而被剔除了一部分有关）。这是为什么？正如向远所说，在20世纪80~90年代，比较文学刚刚在大陆重新崛起的时候，平行研究曾经风行一时。那么，后来为什么不景气了呢？看来，一方面与平行研究的难度较大有关。表面看来，平行研究似乎没有事实联系的限制，作者的施展空间较大，实际上，要想在平行研究中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真正能发现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却并不容易。另一方面，与那时对于所谓“X比Y”模式的过于严厉的批评有关。那时流行的简单的文学比较固然不利于学术的发展，但是，在中外文学中寻找和发现相似之处，并不是什么坏事。因为相似性往往可以成为发现可比性的敲门砖。如果一概否定相似性的比较，甚至加以嘲笑，加上浅薄、比附、拉郎配等罪名，就使得人们再也不敢问津，避之唯恐不及了。那时学术界对于这种比较的批评是必要的，然而，如果能够更全面地加以看待，并且进行正确的引导，也许更有利于学术的发展。至于跨学科研究，现在学者们的观点并不一致。它究竟是研究领域还是研究方法？跨学科是不是必须跨文化，才算比较文学？这些问题都可以进一步讨论，只是希望不要像对待平行研究那样简单和苛刻。

在论述新时期中国比较文学的成就和特点的时候，向远还分析了中国比较文学如何借鉴了法国和美国比较文学的成果又有所超越，如何继承了本土的文化传统又有所创新，读来颇有启发，也发人深思。与此同时，向远还重申了中国比较文学已经成为“全球比较文学第三阶段的代表”这样一种观点。我同意国际比较文学已经发展到第三阶段的说法，也同意东方国家，包括中国，在这一阶段担负着重大的历史使命。因为这是事实。记得我和孙景尧、谢天振两位教授一起主编高教版《比较文学》的时候，也曾提出过类似的观点。但是，对于是不是需要提出“中国已经成为这一阶段的代表”这样的意见，心里实在没底。不过，自觉地意识到历史的呼

唤，树立起这样的责任感，那是十分必要的。

《中国比较文学百年史·前言》的第三部分论述比较文学的兴起，如何使得中国文学研究乃至中国学术文化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尤其在研究视野的扩大、新的研究对象的发现和研究方法的更新这两个方面，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说实在的，作为比较文学领域里的一个老兵，一个一直在为争取比较文学的应有地位而尽力的我，看到这样来高度评价比较文学的意义和价值，着实感到亲切，受到鼓舞。向远的论述也帮助我打开眼界，把比较文学放到整个文学研究的学术领域里来认识它的意义和作用，从而有了登高望远的感觉：原来我们从事的工作，对整个文学事业有着如此了不起的作用！向远的著作帮助我重新认识了自己所从事的工作的价值和意义，因而由衷地感到自豪和欣慰，由衷地祝愿我们的比较文学事业兴旺发达。

向远本来嘱我为他的“著作集”第六卷撰写“解说”，我不知怎样写为好。我一边读他的著作，一边在脑际浮现无数的想法，有时是回忆，有时是思考，有时是感慨，有时是联想，思绪杂乱，无法归总，最后想出以该书“前言”为纲，顺着它的思路，把读时想到的、感受到的一股脑儿塞进去的办法，落笔时，想到哪里就写到哪里，结果写成了一篇“四不像”的随感文字。既已写成，不知如何再改，只能聊以塞责了。

2007年1月24日于多伦多

前言

一

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形成于 19 世纪后期的欧洲。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在没有受到西方直接影响的情况下,中国比较文学也开始萌生。从起源上看,中国比较文学并非直接来自于西方,而是在中外文化冲撞与交流的特定的时代环境中,基于中外文学对话与中国文学革新的内在需求而发生的。

尽管有人将 20 世纪中国比较文学的“史前史”上溯到先秦时代,但中国比较文学并非古已有之。为什么在历史悠久的中国传统学术中未能孕育出以跨越异文化为根本特征的比较文学呢?为什么两千多年中华各民族之间文学的交流、一千多年以佛经翻译为纽带的印度文学对汉文学的输入、一千年间汉文学对东亚国家的传播与影响,却都没有促使中国产生以中外文学交流为研究对象的“比较文学”学科,甚至没有在文学研究中自觉地运用跨文化的比较方法呢?原因很复杂,答案也是多种多样的。或许有人认为,中国人的文化与文学的自豪感,乃至“居天地之中”的“中国”意识不利于比较文学观念的形成。然而 19 世纪的法国人对法国文化与文学也有优越感,也有法国文学的中心意识,但比较文学学科却恰恰成立于此时的法国,法国正是通过比较文学研究弘扬了他们的文学自豪感;或许又有人认为,中国传统学术研究及文学研究的习惯方式是感悟式的评点,不擅长比较文学研究所要求的那种条分缕析的系统研究。然而比较文

学既可以是系统的研究，也完全可能以中国式的感悟评点、点到为止的形式来进行，被许多人誉为比较文学研究楷模的钱钟书的《管锥编》，不就是以感悟评点的传统形式写成的吗？何况，中国传统学术历来主张“文史哲不分家”，这与当代比较文学的一些提倡者所主张的“跨学科”研究岂不是不谋而合的吗？

中国传统学术中未能孕育出以跨越异文化为根本特征的比较文学，其根本原因，首先就是因为传统中国人缺乏那种依靠输入外来文学来更新自身文学的自觉而又迫切的要求。由于汉文学自成体系，作为东亚诸国文学的共同母体，具有强大的衍生力和影响力。汉文学史上的历次革故鼎新，并没有主要依靠外力的推动，而基本上是依靠汉文学自身的矛盾运动来实现的。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学舞台上，一直没有一个外来文学体系堪与汉文学分庭抗礼。佛经翻译虽然引进了印度文学，但那主要是在宗教范畴内进行的，而且又较快地被汉文学吸收消化。在不自觉地引进印度文学的过程中，并没有在中国人的文学观念中产生诸如“印度文学”或“外国文学”之类的观念或概念。没有对等的外来文学体系的参照，就谈不上“本国文学”和“外国文学”的分野，因而也就无法形成“汉文学”、“中国文学”这样的与外来文学对举的概念。而“比较”、“比较文学”总是双边的甚至多边的，这种没有“他者”在场的汉文学的“单边”性，只能是汉文学的“独语”，或者是汉文学对周边异文学的“发话”，而不是汉文学与异文学之间的“对话”。而“文学对话”的意识正是比较文学成立的根本前提之一。在人类历史的发展演进中，“文化对话”对任何一个民族及国家来说，常常不可避免。这种“对话”（抑或“争吵”）往往通过政治、外交、战争、宗教等途径和方式进行着。历史上汉文化与异文化之间有过多次的“对话”或“争吵”，而相对而言，作为“文化对话”之组成部分的“文学对话”，则往往并不是文化“对话”的必需方式。“文化对话”为“文学对话”提供了必要的语境，但有了“文化对话”未必一定就能够进行“文学对话”。“文学对话”需要更具体和更复杂的话语平台，即“对话”所需要的语言能力和异文学文本的阅读能力。而恰恰是这种能力的缺乏，